# 論《詩經》的人文精神的體現及其流傳

雷莎

**摘要**:《詩經》中"國風"及"雅"中的作品,多為怨女棄婦、征夫戍卒、流民浪子"感於哀樂"的底層生活之真實記錄。存在於《詩經》中的這種普遍的生民悲歎,流露的是一種"哀鰥寡"的情懷,也是中國詩歌史上最早的人文精神閃光,並開啟了後代詩歌人文關懷傳統的先河。

關鍵词:《詩經》、人文精神、傳承

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經典作品對照閱讀,是把握不同民族文化特徵的最佳方式。與《詩經》產生年代相近的《荷馬史詩》、古希臘神話,是西方文化傳統的源頭,當其時其地的詩人還在膜拜神靈、崇拜英雄的故事中寄予自身的願望和追求時,《詩經》時代的作者,他們的眼光卻甚為平和,甚至帶有一種俯視蒼生的悲憫,《詩經》裏活躍著的不是英雄或神靈,而是每一個普通甚至卑微的個體;而他們的故事,不是富於激情的挑戰和狂想,更多的是一聲聲低回的歎息與哀鳴。梁啟超論中國文化云:"重實際故重人事,其敬天也,皆取以為人倫之模範也"」,的確,植根於後土,深入於人事,正是《詩經》之"重實際"之處,也是中華文化的厚重深刻處。《詩經》作品所道之事、所敘之情,皆在於人性根本處,映現其間的乃是一種人文精神,在中國文化的初始出便閃動著關懷人性的光芒。

此種原始的人文關懷,一言以蔽之,即"下哀生民"的思想。《易·系辭下》云:"天地之大德曰生"<sup>2</sup>;《尚書·大禹謨》亦云:"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、惟和"<sup>3</sup>,這種厚生愛民的思想,與周初的民本思想相輔相成。《尚書·洛誥》曰:"誕保文武受民"<sup>4</sup>,又"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"<sup>5</sup>,此處,天、命、民三者並稱,天命實則就是眾民擁護之程度,由此而來的"若保赤子"、"用康保民"的強烈愛民觀念,就貫穿於周文化的傳統中。愛民觀念之體現,首要便是關注黎民蒼生的生存狀態,正是所謂"觀風俗之盛衰"然後才能"考見得失",於政事上做相應的調整。《召誥》:"天亦哀一四方民,其眷用命懋,王其疾敬德"<sup>6</sup>;何休《春秋公羊傳解詁》:"故王者不出牖戶,盡知天下所苦,不下堂,而知四方"<sup>7</sup>,正是此意。歷史上的"采詩"、"獻詩"制度,徵之古籍雖無確證,然此二種方式在《詩經》的整理成書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,自是於理可循的。因此,借詩歌來關注個體生命的價

<sup>1《</sup>梁啟超論國學》,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,第146頁。

<sup>2</sup> 王弼注、孔穎達疏《周易正義》,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86頁。

<sup>3</sup> 孔安國傳、孔穎達疏《尚書正義》,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135頁。

<sup>4</sup> 孔安國傳、孔穎達疏《尚書正義》,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216頁。

<sup>5</sup> 同上注。

<sup>6</sup> 孔安國傳、孔穎達疏《尚書正義》,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212頁。

<sup>7</sup> 何休注,徐彥疏《春秋公羊傳注疏》、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2287頁。

值,尤其是那些窮而無告者的心靈悲泣,正是《詩經》人文精神的重要體現。縱觀整部《詩三百》, 其詩主要表現為對四類人生存狀態的強烈關注,以下一一述之。

# 一、怨女棄婦命運的悲歎

《詩經》中的棄婦詩,據統計多達十餘首,其分佈在《召南》、《邶風》、《衛風》、《王風》、《鄭風》、《秦風》、《小雅》各國民風之中,管中窺豹,今人大概能夠想見當時家庭破裂、婚姻惡化之現象的普遍程度。

每一段棄婦故事的背後,都埋藏著一個傷心自悼的故事,而故事中的女子見棄的原因,細細尋釋起來則不外有二。首先即制度上的缺陷,婚姻中男女地位懸殊正是夫妻相怨、女子被棄的首要原因。周代的婚姻制度較之前代有了顯著的進步文明之象,周公"六禮"正是其體現,在如此繁瑣的聘娶制度引導下,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態亦隨之逐漸形成。然而,貴族聯姻則採取男女極不對等的 媵婚制度,如以下兩則記載:

媵者何?諸侯娶一國,則二國往媵之,以姪娣從,姪者何?兄之子也。娣也何?弟也。諸侯一聘九女,諸侯不再娶。—《公羊傳·莊公十九年》<sup>8</sup>

古者嫁女,必姪娣從,謂之媵。姪,兄之子,娣,女弟也。—鄭玄注《儀禮·士婚禮》<sup>9</sup> 可見,媵婚制實則為一夫多妻制,男女在這種不平衡的婚姻關係中,必然生出許多矛盾和嫌隙,最 終導致婚姻破裂。如《邶風・柏舟》中的女子,正是生活在這樣一個一夫多妻的家庭中,時時感受 著"憂心悄悄,慍於群小。觀閔既多,受侮不少"的酸楚與淒怨。在當時社會,男子除了能夠一娶 數女之外,還能數次婚娶,如晉公子重耳在流亡過程中就先後三次娶妻,在狄娶季隗,在齊娶薑氏, 最後在秦更一次納五女。貴族公子的多次婚娶在當時並非特例,《詩經》中亦記載不少再娶重婚的男 子,"但見新人笑,哪聞舊人哭",他們自不去理會女子們的內心悽楚,更有甚者,還將舊婦逐堂遣 返,恩斷情絕怎不讓人可恨可歎。如《召南・江有汜》, 丈夫另有新歡,故"不我以"、"不我與"、 "不我過",程度的加強正顯示男子與其妻之間已無情分可言。再如《邶風・穀風》一詩,丈夫新婚 之時,亦是自己"行道遲遲,中心有違"的下堂之日,"宴爾新昏,不我屑矣",對故妻更是棄之如 鄙履。制度上的缺陷必然帶來道德的缺失,這正是棄婦遭棄的道德成因。統觀棄婦詩,最明顯的感 受便是男子普遍的敗德行為。敗德的行為之一便是重色不重德,喜新厭舊。《詩》中被棄的女子,大 部分德音美好,勤勞能幹,然而終因年長色衰,恩斷愛弛。如《邶風·穀風》,妻子勸其夫"采葑采 菲,無以下體",經學家對此句的注疏雖不盡相同,但均認同此乃男子重色不重德寫照。"葑菲"有 價值可食用的皆為根部,然棄其根而用其莖,正是好色輕德之喻。《衛風·氓》中,女子借喻的"桑 之未落,其葉沃若"、"桑之落矣,其黄而隕"兩句,正是用以形容男子之心隨著女子容貌的衰老而

<sup>8</sup> 何休注,徐彥疏《春秋公羊傳注疏》、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2235頁。

<sup>9</sup> 鄭玄注,賈公彥疏《儀禮注疏》,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968頁。

漸淡變無,可謂色衰愛弛的典型寫照。而《鄭風・遵大路》中,那些"無我惡兮"、"無我醜兮"的 聲聲哀告,寫盡女子美色漸衰之後的情急與淒涼。《小雅·我行其野》詩中,丈夫"不思舊姻,求爾 新特"之行為,雖不是"成不以富"的嫌貧愛富,然只一句"亦祗以異"的怨訴,男子愛慕美色、 喜新厭舊之心明白見之。男子們敗德的行為之二便是不念舊情, 忘恩負義。《詩》中見棄的女子大多 與丈夫識於微時,他們經年累月地操持家務,辛勤勞作,一朝富貴,反被逐下堂,人情冷暖,體會 深處猶感淒涼。《邶風・穀風》中,女主人公"何有何亡,黽勉求之。凡民有喪,匍匐求之",可謂 是黽勉勤力,和睦鄉黨,既能幹又有德音。昔日"育恐育鞫,及爾顛覆",一派鞠躬盡瘁,今日"既 生既育,比予於毒",何其薄幸寡情。然而丈夫的薄幸似乎還不止於此,"不我能慉,反以我為讎", 甚至送故妻出行的要求他都尚且不願,只是"薄送我畿",了了草事,人世炎涼而薄情至此,讀來 令人悽愴不已。《氓》詩中,女主人於丈夫貧賤時,"三歲為婦,靡室勞矣。夙興夜寐,靡有朝矣",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辛勤勞作,等到"言既遂矣"的安樂之時,則"至於暴矣",此中男子,真可謂 德行全無、醜行盡現了。《穀風》一詩《小雅》中亦有.訴說的是相同的的棄婦之悲。"將恐將懼. 維予與女。將安將樂. 女轉棄予". 夫妻之間可共禍患難、不可與共安樂, 富貴之後即下堂的命運, 似乎是那個時代女子的群體悲劇。所以她們在詩中,亦反復控訴男子的敗德行為,如"乃如之人兮, 德音無良"(《邶風・日月》);"士也罔極,二三其德"(《衛風・氓》);"條其嘯矣,遇人之不淑矣" (《王風・中穀有蓷》); "之子無良,二三其德" (《小雅・白華》), 如是之言比比皆是。《詩經》中的 棄婦詩,不盡然皆女子自作,正如顧頡剛所言:"詩是棄婦詩,但不必棄婦自己做,社會上這種事 情多了,文學家不免就採取而描述之。從舊材料裏做出新文章,是常有的事,母題相同是不容諱言 的。"的確,在整個社會逐漸走向禮崩樂壞的過程中,夫妻相怨、朋友棄義、老無所依、少無所養 類似現象在世間只會越來越普遍,棄婦的悲訴只是窺其全貌的一點,詩人或采詩者寄寓其間的,除 了有對這些無依無靠的女子的深切同情之外,何曾沒有對普遍道德缺失的譴責與對整個社會前途走 向的憂慮呢?

自《詩經》大量出現詠歎棄婦悲苦命運的詩作之後,類似題材在後代的詩歌題材中亦反復出現,如漢代司馬相如的《長門賦》、就襲用了《詩經》中無辜被棄,在憔悴中悵望的棄婦形象,來抒寫陳皇后失寵以後的無助淒涼的心境、對武帝情意癡絕的盼望,以及盼而不得的酸楚哀傷。漢樂府中的《上山采蘼蕪》亦是典型的棄婦詩,詩中"長跪問故夫,新人複如何。新人雖言好,未若故人姝"的問答,讓人感受到棄婦的善良寬厚的同時愈發同情她無辜遭棄的命運。《太平禦覽》記載了一首名為《古豔歌》的棄婦詞,其曰:"煢煢白兔,東走西顧。衣不如新,人不如故。"只四句道盡棄婦孤苦無依的形象、世態冷漠炎涼的悽楚。曹植亦有一篇《棄婦詩》之作,擬棄婦口吻塑造了一個"有子月經天,無子若流星"的因無子而遭棄的女子形象,並著重渲染了棄婦難以排遣的孤獨與哀苦,讀之令人神傷。唐代以後,詠棄婦的作品愈見增多,如戴叔倫的《去婦怨》、張籍的《離婦》、顧況的《棄婦詩》、白居易的《後宮詞》、《井底引銀瓶》等等,均為佳作。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新樂府詩《母別子》,此詩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棄婦悲劇,詩的結語尤為警人:"新人新人聽我語,洛陽無限紅樓

女。但願將軍重立功,更有新人勝於汝。"此雖怨恨激憤之語,正道出了整個社會婚姻悲劇的根源。 "新人"和"舊人"永遠只是相對而言,只要人喜新厭舊的本性得不到滿足,類似這樣的婚姻悲劇就 會永遠不停地重複上演。《詩經》棄婦詩啟人深思之處,正在於它們不僅映現了人類過去當時的事 實、還預示了人類在遙遠的將來仍然存在亦無法解決的問題。

# 二、征夫戍卒生活的苦吟

西周末年,王室失信、大國紛爭、戰事頻仍,動盪年代最易導致人命微輕,室家離散,故《詩經》中,總是彌漫著一股濃得化不開的哀愁,充斥其間的,多是征夫戍卒用生命唱出的苦吟。

此類詩歌,當以《邶風·擊鼓》為代表。《擊鼓》一詩,可說是戍卒思歸不得而作的一篇訣別辭。清代喬億言此詩乃"征戍詩之祖"<sup>10</sup>,可謂別具慧眼,全詩如下:

擊鼓其鏜,踴躍用兵。土國城漕,我獨南行。

從孫子仲, 平陳與宋。不我以歸, 憂心有忡。

爰居爰處?爰喪其馬?於以求之?於林之下。

死生契闊, 與子成說。執子之手, 與子偕老。

於嗟闊兮,不我活兮。於嗟洵兮,不我信兮。

詩的首章言南行之事,而著一"獨"字,厭戰自傷的心理俱現,正是朱熹所謂:"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,或築城於漕,而我獨南行,有鋒鏑死亡之憂,危苦尤甚也。"<sup>11</sup> 二章本南行之故,"不我以歸,憂心有忡"一句,思歸之情猶進一層。三章陳軍中怠慢之狀,但見征役之苦,失伍之狀。此章的釋義,絕大多數注家以為是世家訣別之辭,如嚴粲注解:"錢氏曰:'自知必死也,不言死,惟言喪馬,蓋婉辭。'士卒將行,知其必敗,與其世家訣別曰:汝在家居處矣,我必死於是行,而喪其馬矣。身死則馬非我有,唐人詩所謂'去時鞍馬別人騎'也。汝若求我,其於林下乎。言死於林下也。"2 在如此喪馬歸林、失伍離次的混亂戰場中,能夠全身而退極為不易,因此此章即使不做世家訣別之辭解,亦可看做是戍卒負傷甚至命懸時刻的悲吟。人在迷離之際往往出現幻象,有如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。不少戰爭史詩電影中,當主人公浴血沙場命至彌留之際,交錯於眼前的,往往是故鄉清脆的山水農田、靜謐的生活畫面、親切的家人笑臉,此詩的第四章正可如是解之,當日執手相誓、期以偕老的畫面,浮現在主人公腦海中,那是他生命中最珍視的回憶。"執子之手,與子偕老",繾綣之情,只是在平易處用本色語出之,放在當時情境中,卻字字驚心,因為意識和現實,亦有可能變成兩個從此隔絕的世界。詩至此,自然轉入第五章:恐違世家之約,長長的歎息更添沉痛之感。這首詩,雖可作為世家訣別之辭讀之,然而辭中的悲怨何止兒女之情,詩人真正傷懷的,乃死生之際個

<sup>10</sup> 喬億《劍溪說詩又編》,郭紹虞編《清詩話續編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,第1115頁。

<sup>11</sup> 朱熹《詩集傳》,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,第22頁。

<sup>12</sup> 嚴粲《詩緝》,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人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,雖曰訣命,實則透露著於生的至深依戀。唐詩中描寫征夫戍卒的名篇頗多, 陳陶的《隴西行》與此詩詩意庶幾近之:

誓掃匈奴不顧身. 五千貂錦喪胡塵。

可憐無定河邊骨, 猶是春閨夢裏人。

起二句正是征役之狀,境象尤其闊大,後二句則是室家之情,於巧思中寫出深深地哀憫,正是《擊鼓》中"不我信兮"的悲涼終結。《擊鼓》之後,征夫之苦戍卒之悲,亦都從征役與室家兩面寫之,漢代陳琳的《飲馬長城窟行》,唐代杜甫的《新婚別》,代代出新,然其內裏,均深得《擊鼓》之意。

《魏風·陟岵》敘寫征人之事,則別具一種含蓄的悲情。《毛序》謂此詩:"陟岵,孝子行役,思念父母也。國迫而數侵削,役乎大國,父母兄弟離散,而作是詩也。" 13 其說與詩意相符。此詩敘說的人情千古一然,但其手法卻是獨具一格。詩中,詩人未發一語征役之苦、念親之痛,思鄉之情,而全借父母兄長之口吻道出。如此表達方式,更見出戍卒思歸的迫切之心與思家的深厚之情,其情含蓄,所感亦猶為苦澀,蓋以想像之辭以慰己心,正是詩人傷心最深處。方玉潤的分析,也正好是切中了此詩三昧:"人子行役,登高念親,人情之常。若從正面直寫己之所以念親,縱千言萬語,豈能道得盡?詩妙從對面設想,思親所以念己之心與臨行勗己之言,則筆以曲而愈達,情以婉而愈深,千載之下讀之,猶足令羈旅人望白雲而起思念之念,況當日遠離父母者乎?" 14 這種 "對面設想"的手法,錢鐘書先生稱為 "分身以自省,推己以付他;寫心行則我思人乃想人必思我" 15 的手法,被後世詩人廣泛借鑒,如王維《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》:"遙知兄弟登高處,遍插茱萸少一人";白居易《望驛臺》:"兩處春光同日盡,居人思客客思家";章莊《浣溪沙》:"夜夜相思更漏殘,傷心明月憑欄杆,想君思我錦衾寒"等等,皆以此詩為藍本。陳繼揆評論此詩對後代影響時云:"杜詩:'遙憐小兒女,未解憶長安',明知其憶,而反言未解,更進一層。是推陳出新法。" 16 前人認為《詩》篇篇有創意,正是得益與《詩》的首創之功,後代詩人才能在承繼中推陳出新,溪流匯成江海。

《詩經》中有兩首詩,未直言征役之勞戰事之苦,而都是在歸家途中寄託各自哀思,兩首詩分別是《豳風·東山》與《小雅·采薇》。詩中的征人,於歸家途中所憶所想之事,所夢所見之景,是如此真切細微地屬於某個人,亦是如此寬厚博大地屬於每一個人,讓人猶念千載而下,情同此心。

先看《東山》、《詩序》曰:"《東山》、周公東征也。周公東征,三年而歸,勞歸士,大夫美之,故作是詩也。一章言其完也,二章言其思也,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,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。君子之於人,序其情而閔其勞,所以說也。說以使民,民忘其死,其唯《東山》乎?"「此說雖仍難逃以美刺解詩之窠臼,然一貫板著嚴肅面孔的經學家說此詩時,於物理人情的解讀卻也通達,何以?概人之常情用最真實的語言道出,就足以融化世間的一切冷漠。《東山》的好,首先在其選擇了一個

<sup>13</sup> 鄭玄注、孔穎達疏《毛詩正義》,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358頁。

<sup>4</sup> 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,中華書局1986年版,246頁。

<sup>15</sup> 錢鐘書《管錐編》,三聯書店2007年版,第193頁。

<sup>16</sup> 陳繼揆《讀風臆補》,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,第87卷。

<sup>17</sup> 鄭玄注、孔穎達疏《毛詩正義》,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395頁。

獨特的角度——"在路上",即回鄉之路,詩人全然不正面描摹征役之苦,只是讓回家路上的喜怨哀愁匯成一部影像集,映現出征人心靈最深處的真實。這條歸鄉之路是如此之長,長得足夠裝下整整三年的思念。"慆慆不歸"的三年時光,何時不思歸,何時不念家,然真正回歸之時,則是"我東曰歸,我心西悲",翻喜為悲,正是痛定思痛、不勝唏嘘之詞。而歸鄉之路又是如此之短,如此之近,"町疃鹿場,熠耀宵行"的故鄉田園、"有敦瓜苦,烝在栗薪"的家居微物,一切都近得如在目前;"其新孔嘉,其舊如之何",久別重逢的夫妻相聚似乎也伸手可觸,想像與現實的遠近交錯間,便容納了人生無數的苦樂悲欣,於是思念中的一切都變得溫暖可愛,幽冷悽楚的"可畏"都成為溫柔的"可懷",征人飽經滄桑的心於是在這種矛盾中呈現在讀者眼前。《東山》之好,其次在於情境,兩勢貫穿全篇,於是整首詩都蒙上一層迷蒙的哀愁。賀貽孫曰:"每章俱用'零雨其濛'四字點綴,……由此四字,不待終篇已自黯然魂消矣。"18 非是處處有雨,實則只是歸途中雨而已,然"以我觀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"19,詩人的點點詩思才盡被雨淋濕。一首《東山》,可謂繪景如畫、抒情如見、悲喜悵懼,浮想聯翩,沉吟錯綜而天衣無縫,實在是三百篇中的佳作,因此王士禎推崇其為"寫閨閣之致,遠歸之情,遂為六朝唐人之祖"。20

有別於《東山》用處筆曲盡人情的手法,《小雅·采薇》中,戍卒歸途中所聞所見、所思所憶,皆為實錄。全詩結構亦未見起伏跌宕之致,前三章陳久戍不歸的思家之苦,後兩章憶疆場奔走的戰鬥之勞,末章摹楊柳雨雪的途中之景,全從最真處寫出,卻最能點染人的幽思與哀愁。而此詩的末章尤為令人稱道,"楊柳依依"一句,既含當日為國出征的豪邁,有見依依惜別故鄉的深情;而"雨雪霏霏"一句,淒清冷寂的雨雪中,征人久戍歸來,一種飽經滄桑、歷經磨難的心情愈加顯得沉重和悲哀。這句絕佳的融情入景、情境互現的寫法,一直為後代文人激賞不已。如王夫之《薑齋詩話》則道出此句另一妙處:"'昔我往矣,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,雨雪霏霏。'以樂景寫哀,以哀景寫樂,一倍增其哀樂。"21 正是得益於這種用相反的景象來襯托情感的寫法,詩歌才有如此強烈的藝術效果。因此,這種筆法在千古傳誦的過程中,亦被後代詩人視為摹本而反復模仿,如曹植的"昔我初遷,朱華未希。今我旋止,素雪雲飛",俱翻《采薇》之意;顏延年之"昔辭秋未素,今也歲載華";"始出嚴霜結,今來白露晞";王元長之"昔往倉庚鳴,今來蟋蟀吟";韓愈之"始去杏飛蜂,及歸柳嘶螫"等等,今昔物象的變遷牽出往後多少詩人無奈的悲吟,可見《詩經》作意,實在惠及後人。

事實上,《詩經》中征人戍卒的苦吟何止以上提及的幾首,《邶風·式微》裏民眾"微君之故,胡為乎中露"的設問,人民苦不堪言的怨恨之情已溢於言表。《王風·揚之水》裏的征夫戍無定所,歸期無望,只能換作"曷月予還歸哉"的聲聲鳴泣。《唐風·鴇羽》中的戍卒,因服勞役無得歸田,念無力能贍養父母,不覺悲從中來,無助地呼喊著茫茫蒼天:"悠悠蒼天,曷其有常?"《小雅·出車》一詩雖為一首將士凱旋歸來所唱的一首讚歌,但其中仍充斥著征人"王事多艱,維其棘矣"、

<sup>18</sup> 賀貽孫《詩觸》,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・經部》第72冊,齊魯書社1997年版,第263頁。

<sup>19</sup> 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,第1頁,

<sup>∞</sup> 王士禎《漁洋詩話》,《清詩話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,第181頁。

<sup>21</sup> 王夫之《薑齋詩話》,《清詩話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,第4頁。

"憂心悄悄,僕夫況瘁"、"豈不懷歸,畏此簡書"的無奈感歎。《小雅·蓼莪》之詩人亦痛感自己久役不歸不能奉養父母,"哀哀父母,生我勞瘁"的聲聲感歎催人淚下。《小雅·漸漸之石》則通過極為細緻的白描,再現了"武人東征,不遑他矣"的慘狀。《小雅·何草不黃》中,戍卒"哀我征夫,獨為匪民"的質問正是征夫陷入非人待遇的寫照,此詩《詩序》云:"刺幽王也,視民為禽獸,君子憂之"22,此解亦看出了下民生存的苦況。與征夫戍卒悲吟相對的,還有室家思婦的悲歎,此二者本是一體兩面、相依相生的一對統一體。征夫在無邊的勞苦中每每念及"執子之手、於此偕老"的室家溫情,爭奈思婦不是在倍感煎熬的思念中懷想征夫"君子於役,苟無饑渴"的人之常情,這正是李白詩所謂"當君懷歸日,是妾斷腸時"的兩處怨辭。所以如《周南·汝墳》、《召南·草蟲》、《王風·君子於役》、《小雅·杕杜》、《小雅·采綠》等詩,正反映了統治階級的無邊勞役造成世間曠男怨女日多、室家分離愈苦的局面,所以葉燮才說:"《三百篇》中,裏巷歌謠,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。"23

正是因為《詩經》中記錄戰爭徭役帶來的生靈塗炭如此驚心,中國文化中"非戰"的思想在春 秋戰國時期漸漸瀰漫開來。如老子就認為: "兵者,不祥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",並說: "大軍之後,必有凶年",正是看到了戰爭給人的戕害之深;儒家的孔孟面對大國爭霸的現實,主張 王者應行仁政、修德行. 並在諸侯國推行"王道"而反對"霸道";總往和平的墨家更是直接提出 了"兼愛"、"非攻"的思想;就連兵家的代表人物孫子,也把"不戰而屈人之兵,"列在"謀攻"的 首位,並認為其為"善之善者也",雖言兵然思想實質仍是反戰的。這些非戰的言論,正是建立在 人文關懷之基礎之上. 顯示出中國文化淳樸溫厚的一面。此後的詩歌史中, 這種"非戰"情緒的流 露,亦多體現在征夫戍卒的悲吟聲中。此類詩歌的作者身份,主要可分為兩類:一為下層民眾創作 的自發而歌的樂府民謠,二是文人代言的有意為之的文人詩歌。前者如樂府詩中的《十五從軍征》、 《戰城南》等,特別是《戰城南》一詩,把兵戈止息後彌漫於戰場的死亡氣息刻畫得猶為恐怖:"戰 城南,死郭北,野死不葬烏可食。為我謂烏:'且為客豪。野死諒不葬,腐肉安能去子逃?' 水深激 激,蒲葦冥冥。梟騎戰鬥死,駑馬徘徊鳴。"死不得葬,身為烏食,征夫們的身不由己的悲涼命運於 此處被渲染成了無以復加的絕望。至於文人詩的創作,他們除了能感同身受地描述征夫戍卒的悲苦 之外,往往還能鞭辟入裏地揭示造成這種苦難的根源。如魏晉時王粲的《從軍詩》、陳琳的《飲馬長 城窟行》等,於此都頗有感慨。待到唐代,抒寫此類題材的作品更加豐富,王昌齡的《從軍行》二 首、高適的《燕歌行》、陳陶的《隴西行》、柳中庸的《征人怨》等詩皆是其中佳作。

唐代詩人中,惟杜甫記錄征人無盡的苦難最為觸動人心,他的《後出塞》組詩,《悲陳陶》、《新安吏》、《垂老別》等詩篇,皆對人民苦於徭役,征人死於戰爭的慘狀描摹深刻,然最見深度的還是《兵車行》一篇。詩云:"邊關血流成河,統治者猶自窮兵黷武,";"況複秦兵耐苦戰,被驅不異犬與雞"等句,其中描述的征人"不異雞犬"的遭遇,直承《小雅·何草不黃》中"哀我征夫,獨為匪

<sup>2</sup> 鄭玄注、孔穎達疏《毛詩正義》,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501頁。

<sup>23</sup> 葉燮《原詩》,《清詩話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,第589頁。

民"而來,統治者以禽獸待其民的慘況,千年如此。詩中征人親眷們直沖雲天的呼號,集中展現了 那個時代成千上萬的家庭妻離子散的悲劇。而詩中送行者的眷戀、悲愴,行者的憤懣、絕望,透過 視覺與聽覺地雙重表現使得此詩成為描寫征夫戍卒詩歌的翹楚。幾乎可以這樣說,承《詩經》而來 的此類題材已被老杜道盡矣。

# 三、流民浪子亂離的悲聲

《禮記·王制》有記載曰: "凡居民,量地以制邑,度地以居民,地、邑、居民,必參相得也。無曠土,無遊民,食節事時,民鹹安其居,樂事勸功,尊君親上,然後興學。" 社 從以上記載可知,在政治清明、制度穩定的時代,社會各階層亦秩序井然,百姓更能安居樂業,絕不輕易背井離鄉。周代以農業立國,天下黔首安於故土,固守田園,正是周代立國之初就為統治者所重的基本國策。然而一旦制度廢弛、時局混亂,百姓則必流離失所,無所依託。中國文化至誕生起,就與農業、與土地結下不解之緣,農民一旦失去土地,則如《漢書·食貨志》所云: "不農則不地著,不地著則離鄉輕家,民如鳥獸,雖有高城深池,嚴法重刑,猶不能禁也。" 廣大百姓無以為生,"曠土遊民"的現象亦 "不能禁也"。西周末年到春秋時期,禮崩樂壞、政教尤衰,此時正是 "變風變雅" "勃然俱作"的時代,而流民浪子於此亂世中的漂泊之苦與罹難之痛,充斥於《國風》與《小雅》的字裏行間。

據筆者統計, 敘寫浪子流民悲苦的詩歌,《詩經》中就有《邶風·旄丘》、《邶風·北風》、《衛風·何廣》、《衛風·有狐》、《王風·葛藟》、《唐風·杕杜》、《檜風·匪風》、《小雅·鴻雁》、《小雅· 苕之華》九篇之多。這些作品, 有的敘寫了人民無法忍受暴政而相約逃亡, 如《北風》一詩。《詩序》曰:"刺虐也。衛國並為威虐, 百姓不親, 莫不相攜而去焉。" 26 當合詩意。衛國自州籲之亂起, 三世皆亂, 且昏君特別多, 宋公、宣公、惠公皆是淫逸無德, 暴虐人民的昏聵之主。且衛國北方苦於狄人的侵略, 南方受制於齊晉的爭霸, 人民生活苦不堪言, 反映在《詩》中, 即表現統治黑暗、揭露政治腐朽的詩歌格外之多。在表現流民浪人的主題中, 來自衛國的詩篇數量也占半數, 足見其民生活慘澹的程度。《北風》一詩, 正反映了人民不堪其苦的慘狀。詩中"北風其涼, 雨雪其雾"的環境描寫, 渲染出一種嚴酷悲慘的時代氛圍;而"其虛其邪?既亟只且"的自問自答, 使人猶聞那種緊張無比的急促之聲,表現出人民迫不及待逃亡的氛圍,衛國政治之昏暗、人民所遭之壓迫亦可從側面見之。

流離失所的流民浪客,心中最掛念的往往是家鄉風物、故土家園,但現實的慘況往往使他們有家不得歸,有國不能回,《河廣》、《匪風》兩詩正是流民此種心境的絕佳反映。《河廣》一詩,《詩

<sup>24</sup> 鄭元注, 孔穎達疏《禮記正義》,《十三經注疏本》, 中華書局1980年版, 第1338頁。

<sup>25</sup> 班固《漢書・食貨志》,中華書局1999年版,第952-953頁。

<sup>26</sup> 鄭玄注、孔穎達疏《毛詩正義》、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310頁。

序》謂宋襄公母宋桓夫人所作。宋桓夫人系衛人, 如按其所言, 她歸宋之後其詩理當列入"宋風" 而不是《衛風》。有關此問題後代學者多有議論.其中又以陳奐的說法最有代表性: "《載弛》許詩, 《河廣》宋詩,而系列於鄘、衛之風,以二夫人於其宗國皆有存亡繼絕之思,故錄之。"" 宋桓夫人與 《鄘風·載弛》的作者許穆夫人為姐妹,如按陳說,此詩的主旨當是宋桓夫人企望宋國渡河救衛,然 仔細揣摩詩意,無論如何讀不能如《載弛》詩一般繼存宗國的意緒,所以毛、陳之說,自當存疑而 不可俱信。細讀此詩,讀者感受到的只是一個思歸不得的宋人一聲聲絕望的哀呼。衛國在遷都之前 與宋國只隔一條黃河,這條阻斷家鄉的大河在詩人眼中如此之窄,窄得"一葦杭之"、"曾不容刀"; 而家鄉亦如此之近, 近得可以"跂予望之"、"曾不崇朝", 這種誇張的寫法雖然是言過其實, 但是皆 為詩人內心情感的真實反映。縱然家鄉故國在詩人眼裏如同比鄰,然總有什麼原因困擾著這位浪子 無法歸鄉。具體原因詩人雖未明言,然聯繫宋國的政治環境,其國先後有魚石之亂、華向之亂、桓 魋之亂、大尹之亂等等時局動盪,綱紀無存,民被其苦,宋人被迫流亡衛國,迫於國內混亂無堪的 局面而不見歸期,想來亦合情理。《匪風》詩中,浪人漂泊天涯、心懷故鄉的心理在景物的襯托中 格外感染人心。詩的開頭"匪風發兮,匪車偈兮。顧瞻周道,中心怛兮"兩句,渲染出一幅風起塵 揚、車馬賓士的景象. 詩人可能身在車中. 回望來時的遙遙路途. 不覺興起淪落天涯、難抑歸思的 情思。末章"誰將西歸?懷之好音"一句,意即"誰將西歸乎?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。已見思之之 甚,但有西歸之人,即思有以厚之也。"28 正是飄零異鄉,惟願逢人捎回平安訊息,詩人思鄉念親的 情懷,於此句表現得淋漓盡致。唐人岑參之《逢入京使》一詩云"故園東望路漫漫,雙袖龍鍾淚不 幹。馬上相逢無紙筆. 憑君傳語報平安。"詩中情景. 正是祖《匪風》之意而來。

流民不堪其苦而逃亡, 浪子不得歸國而思鄉, 此兩類情事與《詩》中雖有反應, 然終不是此類 主題的主流, 流民浪子痛苦絕望的悲聲, 才是此類詩歌的主流。如《王風·葛藟》, 幾乎可視作流浪 者的乞食之歌, 詩言:

綿綿葛藟,在河之滸。終遠兄弟,謂他人父。謂他人父,亦莫我顧! 詩中反應的世衰民散的慘澹圖景使人倍感沉痛與傷懷。這個流落異鄉的浪子,四處哀求乞食而不得,甚至失去了為人最起碼的自尊,認他人為父母兄弟,然而同情救濟仍舊未得,還盡受旁人的白眼。方玉潤評此詩曰:"故人一去鄉里,遠其兄弟,則舉目無親,誰可因依?雖欲謂他人之父以為父,而其父反愕然而不之顧;即欲謂他人之母以為母,而其母亦恝然而不我親;父母且不可以偽託,況昆弟乎?則更澹然焉如無聞也。民情如此,世道可知。誰則使之然哉?當必有任其咎者,即謂平王之棄其九族,而民因無九族之親者,亦奚不可?"如此言將流民的苦痛歸咎平王的言論雖有不妥,然對世道民情的把握尤其深刻,這正是王道盡失的亂離之禍盡由人民承擔的典型寫照,詩中那失去本根,無以為生的沉痛語讓人不忍卒讀。此外《邶風·旄丘》與《唐風·杕杜》兩詩,表達的主題與

<sup>『</sup> 陳奐《詩毛氏傳疏》,中國書店1984年影印本,卷五第21頁。

<sup>38</sup> 朱熹《詩集傳》,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,第100頁。

<sup>29</sup> 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,中華書局1986年版,第199頁。

此詩相類,皆是流亡者求助與人而不得的悲聲,與《王風·葛藟》一道組成了亂離時代流民無助的 悲歌。

此外還有一部分詩歌, 真切再現了流民浪子悲慘的生活處境與絕望的精神狀態, 《小雅》中《鴻雁》、《苕之華》兩詩正可觀之。《鴻雁》詩云:

鴻雁於飛. 肅肅其羽。之子於征. 劬勞於野。爰及矜人. 哀此鰥寡。

鴻雁於飛, 集於中澤。之子於垣, 百堵皆作。雖則劬勞, 其究安宅。

鴻雁於飛, 哀鳴嗷嗷。維此哲人, 謂我劬勞。維彼愚人, 謂我宣驕。

此詩以鴻雁起興,刻畫了一幅鴻雁哀鳴於曠野,流民徘徊於荒郊的慘澹圖景。這群被貧窮困苦的生活折磨的幾近麻木的流民,抬眼見到遙遠的天際飛來一群大雁,他們的聲聲哀鳴牽扯著流民孤苦的心弦,於是情不自禁地吟唱出這首哀歌。然而,鴻雁之聲雖哀,然它們尚能集於沼澤,找到棲息之地,反觀自己,流離失所,終日勞頓而無所居,人不如物之感讓人更感淒涼。東漢劉陶上桓帝疏中云:"臣嘗誦《詩》,至於鴻雁於野之勞,哀勤百堵之事,每喟爾長歎。"此詩詠鴻雁而傷己哀的情感力量感人若此,後代遂以"鴻雁"作為流民的代名詞,"哀鴻遍野"亦成為亂離時代流民遍地,無以托身的現實寫照。而《苕之華》一詩,則將難民的慘狀寫的最為驚心沉痛:

苕之華, 芸其黄矣。心之憂矣, 維其傷矣。

苕之華, 其葉青青。知我如此, 不如無生!

牂羊墳首, 三星在罶。人可以食, 鮮可以飽!

此詩以苕華起興,其義正如王引之所言:"詩人之起興,往往感物之盛而歎人之衰。"<sup>30</sup> 詩人正是有感於花草生長的茂盛而歎人反憔悴不堪的苦況。接下首章歎 "維其傷矣"的哀怨;次章抒 "不如無生"的悲涼;卒章 "人可以食,鮮可以飽"一句猶為痛徹人心,王照圓曰:"人可以食,食人也。鮮可以飽,人瘦也。此言絕痛",正寫出了人即使欲生而無以為生的無盡絕望。這種層層深入的寫法,王照圓評曰:"苕華芸黃尚未寫得十分深痛,至牂羊墳首,三星在罶,真極為深痛,不忍卒讀矣。"《苕之華》一詩,位於《小雅》末端,其與《何草不黃》一道,用 "不如無生"的痛絕感傷,與 "獨為匪民"的非人悲歎,組成了一曲讓人太息彌日的哀歌,《詩經》編訂者用意之深,尤讓人感歎。《三國志》卷八記當時的亂象曰:"今四民流移,托身他方,攜白首於山野,棄稚子於溝壑,顧故鄉而哀歎,向阡陌而流涕"<sup>31</sup>,道盡流民浪子心懷故鄉、無所依託、困頓饑饉的慘狀,正可為《詩經》中此類詩歌作注矣。

<sup>30</sup> 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,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,第182頁。

<sup>31</sup> 陳壽《三國志》,中華書局1999年版,第200頁。

# 四、使臣胥吏勞苦的怨辭

《孟子·萬章下》對上古時期階級制度有如此記載:"大夫倍上士,上士倍中士,中士倍下士;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,祿足以代其耕也。" 2 周代社會等級森嚴,各階層之間秩序井然的狀況於此可見矣。其中處於最下層的 "下士",雖可以免去躬耕勞作之苦,然而身處統治階級的底層,身為微官小吏,他們公事繁忙而又俸祿微薄,仕宦的苦辛,生活的重擔常常讓他們對人生嗟怨不已,時而發出無可奈何的長歎。如《邶風·北門》一詩中的小官吏,因為 "王事適我,政事一埤益我",繁重的公務已讓他不堪其勞,儘管勞苦若此,他的生活仍然入不敷出,"終窶且貧",回到家中又受到家人無端的責難。面對這種內外交迫的困境,他無能為力而又無可奈何,只好將自己的不幸歸於天命,反復重複著 "已焉哉!天實為之,謂之何哉"的歎息。《北門》詩中胥吏的這種生活境遇與黯然心態,可視作其時小官吏的普遍遭遇,《齊風·東方未明》一詩用女子的口吻,用傳神的鋪陳,將一個 "不能辰夜,不夙則莫"的早晚不得休息的小官吏形象刻畫得惟妙惟肖。其中 "狂夫瞿瞿"的神態刻畫,"顛倒衣裳"的動作描寫,已微露出官吏之妻的輕視之意,這種心態正是《北門》詩中"我入自外,室人交徧謫我"的潛在心理反應。

除了小官吏內外交困的生活反映外,《詩經》裏還存在不少表現使臣奔波於外、勞苦不堪的詩歌,如《召南·小星》、《小雅·四牡》、《小雅·四月》諸詩。《小星》詩中因有"抱衾與裯"一句,被毛序認為是"賤妾進禦於君"。之詩,實則謬之。方玉潤力辟《詩序》之謬,曰:"詩中詞意唯衾綢句近閨詞,餘皆不類。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。且即使此句為閨閣詠,亦青樓移枕就人之意,豈深宮進禦於君之象哉?姚氏際恒解此詩,引章俊卿之言,以為'小臣行役作',因推廣其意云:山川原隰之間,仰頭見星,東西歷歷可指,所謂'戴星而行'也。抱衾綢云者,猶後人言襆被之謂。'寔命不同',則較'我從事獨賢'稍微渾厚。若謂眾妾,則是乃其常分,安見為後妃之惠及妾媵乎?"¾此論對《詩序》之誤一一進行駁斥,有理有據。然方氏解詩認為小臣行役乃是"自甘",亦稍顯偏頗。詩中使臣的對於"肅肅宵征,夙夜在公"的勞苦之狀,僅加以"寔命不同"的長歎,這種命運的悲歎雖不如強烈的呼告般怨恨激憤,然詩人的感傷與悲哀亦可明白見之,絕不如方氏所說,是"循分自安,毫無怨懟詞"。《小星》中的使臣,心中雖有怨憤,然勤勞王室,克盡其職,只將悲苦的生活歸之於命,可見其忠厚之心。這種忠厚的心聲,同樣出現在《四牡》詩中。詩中使臣反復感歎"豈不懷歸,王事靡鹽"的苦痛,非全在於"不遑啟處"的辛勞,而是由於"不遑將父"、"不遑將母"的愧疚。《毛傳》云:"思歸者,私恩也;靡鹽者,公義也;傷悲者,情思也。"5《鄭箋》發明之:"無私恩,非孝子也;無公義,非忠臣也。君子不以私害公,不以家事辭王事。"5。可見此詩,寫進使

<sup>32</sup> 金良年《孟子譯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,第215頁。

<sup>33</sup> 鄭玄注、孔穎達疏《毛詩正義》,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291頁。

<sup>34</sup> 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,中華書局1986年版,第111頁。

<sup>35</sup> 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,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406頁。

<sup>36</sup> 同上注。

臣"忠孝不能兩全"的進退維谷之心態。這種矛盾的心理,亦是中國後世文人兩千多年來面對的相同心理困境。同樣是苦於行役,《四月》詩中的使臣,在抒發己之怨思的同時,對巡行之地的民生世態亦有著深入的觀察,對民眾的痛楚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。詩中的使臣,在行役的過程中曆夏、秋、冬之三季,經江漢、南國之廣域,其行役日久,曆地之廣,足見其奔波勞苦之狀。因為行役詩人不得歸祭祖先,心中憤懣無極,故首章發以"先祖匪人,胡寧忍予"。接下追憶行役時的苦辛,詩人雖備受寒氣暴風的侵襲,然身體上的苦痛怎麼也比不上心中的彷徨與憂懼,耳目所見盡是"亂離瘼矣"的民生慘狀,且上位者仍"廢為殘賊,莫知其尤",如鄭玄注云:"山有美善之草,生於梅栗之下,人取其實蹂躪而害之,令不得蕃茂。喻上多賦斂,富人盡財,而弱民與受困窮。" 類 横徵暴斂的世態讓詩人頗感憂心,遂有"我日構禍,曷云能穀"的傷己憂時之感。縱觀全詩,詩人將行役中感事傷亂、憂己憂民的情懷融入到入目之景的興法之中,詩人的怨思故而渾然無跡。

統觀這些使臣胥吏勞苦的怨辭,明顯的感覺便是一種敦厚篤實之心深埋詩中。創作這些詩歌的小官吏,社會地位儘管不高,然而他們心系宗國拳拳用心、勤於王事的兢兢態度,不可謂不深。縱使行役奔波勞苦不堪,縱使政務繁忙內外交困,他們仍是怨天而不尤人,對宗主、對國家充滿一篇赤誠之心,對生民亦飽含同情。所以他們的詩歌,沒有呼天搶地般的詛咒與痛罵,只是一聲聲低回的哀歎與怨思。這種影響是深遠的,其在人格上淘養了後世文人士大夫"人在江湖、心存魏闕"的忠誠之心,而在文學上則導致了委婉含蓄、溫柔敦厚的風格取向。《詩經》之經典,正是在潛移默化處陶冶情懷,劃定風格。高適《封丘作》詩云:"拜迎長官心欲碎,鞭撻黎庶使人悲",或許可以用來代表這些使臣胥吏的心聲。

總之,《詩經》中的詩篇,多系於上述四類人的生存感歎之中,閃現於其中的,正是一種溫厚篤實的人文關懷。且其中每一類詩歌,均開導出後代於此類詩歌相對應的主題。正如清人喬億所言:"蓋《雄雉》,思懷詩之祖也;《旄丘》、《陟岵》,羈旅行役詩之祖也;《擊鼓》、《揚之水》,征戍詩之祖也;《小星》、《伯兮》,宮詞、閨怨詩之祖也。"<sup>38</sup> 更為關鍵的是,這些棄婦怨女、征夫戍卒、流民浪子、使臣胥吏,他們絕大部分身處社會底層,如此多的哀歎與悲歌彙集一處,如百川歸海,其形成的乃是一種廣義的人文精神。這種精神,後代詩人承其續而揚其波,終而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流韻不絕的人文關懷之統緒。

(武漢生物工程学院講師)

作者簡介: 雷莎(1980-): 文學博士,講師。武漢生物工程學院社會科學處副處長。主要從事中國 古代文學以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研究。

聯繫方式:湖北省武漢市新洲區漢施路1號武漢生物工程學院 社會科學處

郵編: 430415: email:23920659@gg.com

<sup>37</sup> 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,《十三經注疏》本,中華書局1980年版,第462頁。

<sup>\*\*</sup> 乔亿《剑溪说诗又编》,郭绍虞《清诗话续编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,第1115页。